

司马迁经济思想及经济著作注

阎汉武 田化青 袁存惠

4.2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言

司马迁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崇尚商品经济。从他的经济著作《史记·货殖列传》和《史记·平准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先秦时代我国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周出现了专营贩卖的商贾，春秋战国时代有子贡、白圭、范蠡、管仲等工商巨子；秦始皇时代的乌氏倮、巴蜀寡妇清富埒天子。他们为求富益货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古代我国物质文明作出了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可见，两千多年前，我国商品经济已居世界前列。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自然经济解体,从而动摇其统治地位。所以从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工商业列为贱业,把工商业者列为末民。并用政治力量恣意掠夺摧残,造成根深蒂固的轻商贱商习俗,使商品经济裹足不前,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沦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期间,不乏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司马迁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早在西汉重农抑商思想占绝对统治的时代,就公开打出了反对抑商的旗帜,但在封建统治阶级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不会被采纳的。历代学者为了不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只字不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其经济著作也很少有所阐述。

司马迁的经济著作表达的思想是深刻而丰富的,多进步史观。他所总结货殖家的经验如:按客观经济规律从事工商业活动、市场调查、市场预测、经济决

策、货殖家的素质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论述,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同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方针指导下,商业成为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商业工作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抑商、贱商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司马迁却为我们留下一笔熠熠生辉的遗产。阎汉武、田化青等同志在忠于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注译出来,而且阐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普及性。它的出版,对弘扬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填补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方面的空白,无疑是个有益的探索,值得广大经济工作者,尤其是财税、金融、商贸工作者一读,并期望在这方面有更多更好的专著问世。

程法光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

目 录

序言.....	(1)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
《史记·货殖列传》注译.....	(17)
《史记·平准书》注译.....	(97)
附录：陶朱公经商理财十八则.....	(153)
后记.....	(155)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344-1011-1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古代世界文化名人。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经济思想家。他的名著——《史记》，记录了中华民族从黄帝到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内容浩瀚，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货殖列传”、“平准书”是记载经济的篇章。这两卷著作是我国最早记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的文献，开创了史书记载经济的先例。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先秦到汉武帝时代的国内的经济区划、丰富的物产分布，星罗棋布的通都大邑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物事迹。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的面貌，展现出商品经济以及从事商品经济的货殖家为了求富益货而对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史记·平准书》记载了从汉初至汉武帝当政时的财政经济制度及其利弊。这两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商品经济思想。

反对重农抑商
首倡本末并重

自然经济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长期以来是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虽然商品经济在先秦时代就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历代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却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商鞅首创，经荀况、韩非等人发展而来的。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群雄竞相称霸的时代，他为了使秦国富强两次实行变法。其核心是推行农战政策，主张“重农抑末(工商业)”。在他的变法令中就规定：努力从事耕织(农)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从事工商的人可能沦为奴隶。为了奖励农业、抑制工商业，还采取“以粟出官爵”(《商君书·靳令》)，对农业轻税、对工商业重税“使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商君书·内外》)。孟子称工商之民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篇》)。荀况提出“工商重则国贫”(《荀子·富国》)。韩非则斥农业以外的人一概为社会的害虫称“五蠹”，并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五蠹》)，韩非将农称为“本”，工商称为“末”，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口号，亦称为“重农抑商”。经过上述几人的发展和完善，“重农抑商”就成为封建王朝沿用的基本国策。

秦始皇灭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曾多次将商人和罪犯一并谪发边疆，造成歧视商业的社会风气。汉朝崛起，汉高祖刘邦一登基就发布“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以困辱之”(《史记·平淮书》)，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作官、不得占地、不得骑马和携带兵器。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则更胜一筹。刘彻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凭藉汉初七十年休养生息聚集的经济实力，对外通西域、开发西南夷，统一了广大国土；对内兴修水

利、移民垦荒、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汉武帝又是一个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的君主，他在“通西南夷道”、“筑卫朔方”、“迎降赏赐”、“穿渠转漕”、“养马击胡”、“祭祀封禅”、“巡游耀武”等活动中，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消耗，他先后推行的“铸钱”、“牧马”、“告缗”、“卖官赎罪”、“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措施，掠夺民财、与民争利。公元前119年，他颁发“告缗令”（《史记·平准书》），向工商业家征收财产税，凡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者，鼓励他人检举揭发，并将被揭发人财产全部没收，其中一半奖给告发人，还要罚被告人充军一年。在酷吏杨可的主持下，告缗之风席卷全国。经过算缗、告缗，朝廷掠夺的民财数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没收的房屋不计其数。工商业家经过这次打击，中等以上家户大都破产。汉武帝还任用酷吏和“兴利之臣”，对币制进行频繁的改革，借以掠夺民脂民膏。汉朝廷虽然从掠夺民财中解救了由于连年战争和穷奢极欲所造成的财政危机，但却导致了生产衰退，人口外流，民暴四起，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史官，幼年“耕牧于河山之阳”，深知民间疾苦，后随父迁居习文，二十岁时他决心继承父志作一个好史官，他多次出游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第一次他漫游了江浙、两湖、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约三十岁任郎中，随从汉武帝左右，那时，正当汉武帝文治武功达到极盛时期，他随武帝巡游西北、登崆峒山、出肖关到宁夏、内蒙河套一带；接着奉武帝派遣慰问西南少数民族、有机会遍游西南各地；他还随汉武帝登泰山封禅（祭祀），去河南黄泛

区背柴塞河导流。由于司马迁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目睹各地丰富的物产。目睹货殖家“周流天下”，促使了通都大邑的繁荣，促进了农虞工商的发展，使全国各地人民享受共同的物质文明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司马迁以朴素的唯物史观，观察社会的经济活动，在肯定了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有重要地位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不赞成先秦以及汉初的抑商政策，更不满汉武帝的巧取豪夺，同时，他还经历了为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无钱赎罪而忍辱服刑的痛苦。他以一个史官应具有“不虚善、不隐恶、不与圣人同是非，不畏权贵”的品质从事写作。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精辟地提出“本末”并重的主张，公开打出了反对抑商的旗帜。司马迁把社会经济主要分为农虞工商四个部门，并阐述其职能：“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农虞工商四者是“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把农业和商业，生产和流通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同为富国富民之本，不存在尊卑贵贱之分，也不必重此抑彼，这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还说：“穷富之道，莫之夺予”，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从事农虞工商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经营商业可使“商品之交易通”，可使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社会经济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的向前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司马迁还列举出历史上“本末”并重而富国强民的例

子：一是战国时期，齐国土地盐碱化严重，农产品匮乏，人口流失，国力薄弱。但是，齐国善于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的措施，很快富裕起来，流失的人口返回，财物聚集、纺织品遍布天下。从东海到泰山一带的诸侯都到齐国朝拜，国力大振；二是吴国灭越国以后，越王勾践困于会稽，受尽凌辱，他于患难之中采取计然之策，农商并举，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富民强、雪耻复兴，号称“五霸”。

司马迁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产生和改革。他说：“工农交易之路通、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他认为秦统一货币，将珠玉、龟、贝等不便携带，不适应在商品流通中作为货币，而退为“器物宝藏”是合乎经济发展需要的。他赞成币制改革，但对汉武帝出于掠夺民财的目的而频繁的变更币制以及借推行平准均输掠夺工商业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汉武帝为弥补国库空虚，在推行告缗令的同时还听从酷吏张汤制造和推行“皮币”，那时，皇家园林饲养着许多白鹿，用约一平方尺的白鹿皮，在四边绣上花纹即为“皮币”，一张皮币，面额定为四十万钱，凡王侯、宗室向皇帝进贡送礼，必须以皮币作“荐璧”（荐璧是给皇帝呈献贡物的盘子），呈献贡物必须先以四十万钱买一张皮币，用皮币托上礼物才能进献。推行“皮币”开始，汉武帝和张汤曾问大司农颜异，廉吏颜异说：“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武帝不高兴，张汤平素和颜异不和，借机治颜异的罪，颜异不服，微启嘴反唇以示鄙视，张汤报奏汉武帝说颜异腹诽皇上，汉武帝以“腹诽罪”处颜异死刑，自此

就有了腹诽罪和治腹诽罪的刑法。由于汉武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干戈日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百姓借汉武帝下令求雨之机，呼喊出：“烹弘羊、天乃雨”的愤怒。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他一反百子诸家不谈商论贾的先例，记录了经济发展中最本质的问题，可谓慧眼独具。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作《史记·货殖列传》的缘由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史记·平准书》是“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虽然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建设一个封建盛世，未能超出封建士大夫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却是超时代的，正如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发展商品经济呐喊 为货殖家树碑立传

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要求广交博闻，和广阔的市场。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冲破封建割据的羁绊，破除无欲无为、闭关自守、小国寡民、安于贫贱、鄙视商业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卷首，开宗明义批判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所谓“至治之极”的理想社会是“涂民耳目”的欺世之谈，是倒退的、反历史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他指出“虞夏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的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求富，司马迁认为是人的本性，是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仅农虞工商的活动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推崇管子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认为一定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物质基础的反映，因此，他认为对于民之求富，对于社会财富的发展最好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海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重要的是加强宏观调控、节制剥削、缓和矛盾，满足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愿望。司马迁还无情的驳斥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形似道貌岸然，动辄高唱“不崇势利”、“不羞贫贱”的权贵富豪，说如果你们不富有，怎么会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呢？孔子所以能名扬天下不就是和他的学生子贡经商致富“聘享诸侯”有直接关系吗？牧人乌氏倮、寡妇巴蜀清能与秦始皇“分庭抗礼”，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吗？揭穿了统治阶级及其辩护士欺骗匹夫编户之民的说教。司马迁还十分赞赏管子的“富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论，反对与民争利，把民富国强提到规律性高度来认识。

对于求富益货，发家致富的途径，司马迁认为最容易的是经营商业。他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他认为经营商业并不可耻，相反的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隐士、匿居深山

僻巷，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连妻子儿女都养活不起，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宗的钱都没有，而“好语仁义”的人，才是可耻的。

司马迁不厌其详的列举了历史上一大批富商大贾的事迹，他认为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因为经营工商业致富的“素封”之家，是能者，贤人，应该为他们正名立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其立传的货殖家很多，著名者有：子贡，孔子的学生，他经商于曹国和鲁国之间发财致富，结驷连骑，和诸侯“分庭抗礼”也使孔子名扬天下。计然，擅长经商之道，向越王勾践提出七项强国之策，越王只用了五项，就使越国强大起来，终于打败了吴王夫差，建立了霸业；范蠡，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运用计然之策帮助越王复国雪耻，官拜上将军，后来辞官在定陶经商十九年，三致千金，他把赚来的钱分赠给穷朋友和远门兄弟，请他们共享富裕，后人称“陶朱公”。范蠡还把他的经商经验总结为“经商十八则”，流传后世。白圭，战国时周人，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商人。由于他经商有术发财致富而名扬天下，他的经商理论为后人效法，故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经营畜牧业的戎族人乌氏牧长保和经营朱砂矿的巴蜀寡妇清，拥有大量财产，受到秦始皇的重视，“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这二人能够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原因是“富而主上重之”。此外，他还举采矿冶铁富“拟于人君”的猗顿、蜀氏卓；以“独窖仓粟”发了财的宣仁氏；以赍贷子钱”获利的无盐氏，说他们都是以末业致富的巨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是“贤人所以富者”。给了很高的评价，让他们

的美名永载史册。

司马迁重视商业，但也不是片面夸大商业的作用，他认为农虞工商干哪一行都大有作为：陆地牧马二百蹄、或牛蹄角千、千只羊、千只猪、或千树枣、千树桔、千亩漆、千亩麻、千亩竹、或酒千酿、酱醋千缸、或宰畜千皮、贩谷千钟……其收入都可比得上一个食邑千户的“封君”。司马迁还把致富的门路分为上、次、坏三等，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坏”。他把那些盗贼、赌棍、杀人越货、劫人为奸，挖坟掘墓、乘人之危攫取不义之财之徒，则斥之为“奸富”，对奸富不仅舆论上要声讨，而且要绳之以法。

总结货殖家的经验 以供后世观择

司马迁虽然认为经营商业是“求富益货”的捷径，但是要成为一个货殖家，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他说：“而富者必用奇胜”。他总结计然、范蠡和白圭等大的工商业家经营的经验是：

乐观时变、果断决策。越国大夫范蠡和尊为商人鼻祖的白圭，善于从调查研究入手，捕捉市场信息，预测商品供求变化趋势，从而做出经营决策。范蠡巧用计然之策，“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在贵的上限或贱的下限，做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决策来。白圭则是乐观时变的高手，他把握市场变化的契机，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针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根据天时地利，使商

品购销不误农时，“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在决策时，要当机立断，分秒必争，像“猛兽挚鸟之发”。否则收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产销兼顾，多中取利。范蠡经商认为农产品的价格不能高低悬殊。“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便是不利商业的发展。认为粮食的价格应当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白圭则是“欲长钱，取下谷”，经营广大消费者需要的大路货，虽然利润少，但销量大，也能多中取利。他在实践中感到：生产是流通的基础，农业上去了，商业也跟着发达。所以主张“长石斗，取上种”，供应优良籽种，促进粮食丰收。

平糶齐物、关市不乏。即是说，物价平稳，市场才能繁荣。稳定市场物价的核心是保持粮价的稳定。建议，在市场粮价过高时，政府或政府规范商人及时抛售粮食，平抑粮价，保护农民利益，粮价稳，百物稳，市场商品就不会紧张。

储好商品、周转不息。“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炭。”说的是这些笨重、易耗、费用大的商品，运输路线长，周转慢，经济效益差，以就近经营为好。“务完物，无息币”，要求在商品储存环节上，保持商品的完整无损，同时要快进快出，不能停滞，不要“敢居贵”，不要屯积居奇，待价而估，以加速商品资金周转。对容易“腐败而食（同蚀）之物勿留”，以免造成损失。

擅长一技、出奇制胜。司马迁认为经营工商业要专心致志的钻研技术，要有一技之长。只有掌握一门技艺，才能在竞争中出奇制胜。他举出贩油、卖牛羊杂碎、启刀磨剪子、